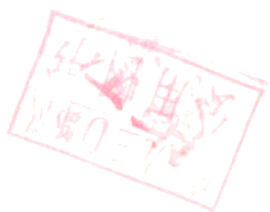


25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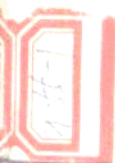
1860年《北京条约》

[俄] A·布克斯盖夫登男爵 著



26

1



D826

俄中外交关系概要之一

1860年《北京条约》

〔俄〕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著

王瑾、李嘉谷、陶文钊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注明原书版本。



1171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Баронъ А. Буксевденъ
РУССКІЙ КИТАЙ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ъ сношеній Россіи
съ Китаемъ
1. ПЕКИНСКІЙ ДОГОВОРЪ
1860 г.
Портъ-Артуръ.
Изданіе книжнаго склада "Новый Край".
1902 г.

2102/18

内部读物

1860 年《北京条约》

〔俄〕А. Буксеев著
王瑾、李嘉谷、陶文钊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5印张 121千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49 定价：0.50元

出版说明

《1860年〈北京条约〉》原书出版于1902年，是拟议中的《俄罗斯中国（俄中外交关系概要）》丛书之一。作者布克斯盖夫登是当时俄国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尉官。

本书主要记述了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1859—1860年出使中国的有关情况。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沙俄就悍然违反《尼布楚条约》，一再侵入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地区。1854—1857年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又屡次派兵，以武力强占我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和下游地区，并于1858年5月强迫清政府黑龙江将军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这样，沙俄一举侵吞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还强行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我国领土为中俄共管。与此同时，沙俄公使普提雅廷又与英、法、美三国紧密勾结，进行军事、外交讹诈，并于1858年6月抢先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

《璦琿条约》墨迹未干，沙俄侵略者便故伎重演，再一次使用先“实际占领”，然后逼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的惯用手段，一面着手吞并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面派遣伊格那提耶夫来华，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的割地条约。

1859年6月至次年5月，沙俄侵华的爪牙伊格那提耶夫在北京大肆活动，胁迫清政府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割让给俄国，声言，如不遂所愿，中国就要冒同时对英、法、俄作战的危险。沙俄的这一讹诈未成，伊格那提耶夫便离京前往上海，参与英、法侵略者的

强盗勾当，积极充当帮凶。英、法联军进犯津、京时，他紧随联军北上，百般挑唆怂恿，积极出谋献策，为他们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和他们共同研究攻城计划，并将俄人私自测绘的北京地图交其使用。北京被英、法联军强占后，伊格那提耶夫又急忙赶到北京，伪装成“调停者”，帮助英、法侵略者展开对清政府的逼降活动。他把沙俄标榜为清政府的“公正保护者”，同时对清政府大肆恫吓，迫使其“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使英、法侵略者得以迅速迫签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伊格那提耶夫一等英、法侵略军从北京撤走，便以沙俄“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勒索“斡旋”的“报酬”，并公然以武装侵略和叫回英、法侵略军相威胁，向中国提出了新的大量的领土要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早已被帝国主义的大炮吓破了胆，于1860年11月14日被迫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从此，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广大领土又落入了沙俄的魔爪之中。条约中还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境内的湖泊河山作为划界的标志。

本书记述了伊格那提耶夫的上述种种侵略活动。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沙俄侵吞中国大片领土的罪行大肆讴歌，洋洋得意地把它称作是沙俄“外交活动中光辉的一页”；对伊格那提耶夫的两面三刀、软硬兼施、凶险狠毒的卑劣行径则竭力美化，为其树碑立传。本书充斥着“侵略有理，扩张有功”的谎言谬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沙俄帝国主义掠夺成性的强盗嘴脸，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某些侧面。

1974年10月

作 者 的 话

几乎就在1900年中国发生事变之初,我幸运地获得了大量资料(外交部也存有此项资料),使我得以出版本书。

我十分清楚,作为我国外交活动中如此光辉一页的《北京条约》的历史,应由一位比我高明的作者来写才能胜任。但是,考虑到所报导的这些很少有人知道的事实都是有意义的,如能及时将其发表,或可弥补此项不足,因此我终于担负起了这项工作。

遗憾的是,本书出版比预期花了更多的时间,以致当全世界都紧张地注视着远东所发生的一切时,错过了这一最有利的时刻。造成如此出乎意料的延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工作条件不利。在当时条件下,必须在太平洋分舰队的船上边航行边工作;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周围所发生的事变显得特别错综复杂,也影响了各种非中心的任务。

基于上述情况,我衷心希望关心的读者对书中由于工作条件不利而造成的错误,予以谅解。

海军中尉 A·布克斯盖夫登男爵

原书出版前言

俄中外交关系概要第一部分包括俄国外交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即以签订《北京条约》为结束的 1859 至 1860 年这一时期。今后，随着资料的逐渐充实，尚拟写一本关于 1900 年和 1901 年最近事变的著作，使本概要臻于完备。

全世界正以普遍紧张的心情注视着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希望现在出版的本概要的第一部分，能受到公众的注意。

出版者

1902 年 1 月 20 日于旅顺

目 次

第一章1

一、1858年普提雅廷伯爵签订《天津条约》。 二、1859年任命伊格那提耶夫将军赴中国筹办军务。 三、中国拒不接受俄国提供军械。伊格那提耶夫处境发生变化。 四、进入北京。开始谈判。中国当局宣布否认《璦琿条约》。 五、英国在大沽战败。美国公使华若翰受挫。 六、谈判中断三个月。俄国代表的尴尬处境。 七、外交部确认伊格那提耶夫的公使职衔。“德日基特号”驶抵北塘。 八、中国政府不放伊格那提耶夫出北京。伊格那提耶夫强行离京。

第二章40

一、伊格那提耶夫到达上海。结识英、法两国特使。冷淡的接待。伊格那提耶夫通告说明该使团的出使目的。 二、乘“斯维特拉纳号”赴日本及北直隶。英、法分舰队驶抵北塘。华若翰的难堪处境。 三、联军陆战队登陆。向俄国旗帜鸣放礼炮而引起的误会。 四、炮轰并占领大沽炮台。联军与中国当局开始谈判。 五、占领天津。伊格那提耶夫改乘“拉兹鲍伊尼克号”沿白河前往天津。 六、伊格那提耶夫的任务：博得敌对双方的信任，并充任双方的调停人。 七、谈判破裂。

第三章83

一、联军向通州进发。 二、联军与僧王军队冲突。英、法两国官员和翻译官被俘。 三、八里桥之役；任命恭亲王为 新任全权大臣。联军之间的齟齬。清帝逃出京城。 四、决

定炮轰北京。中国当局释放俘虏并交还被虐杀的俘虏遗体。联军又一次发出最后通牒。 五、占领并抢劫海甸宫殿。落入英方手中的档案库和俄方文件。伊格那提耶夫的 危险处境。六、葛罗男爵希望伊格那提耶夫出任调停。离开通州进入北京。 七、中国当局请求出面调停。伊格那提耶夫接受请求。停止炮轰北京。联军向中国当局提出的最后通牒，在伊格那提耶夫促成下对此作出的答复。 八、和谈开始。联军与中国当局签订和约。 九、伊格那提耶夫就俄、中问题进行谈判。普鲁斯的突然来到。联军撤兵。英、法两国特使离去。 十、1860 年 11 月 2 日签订的《北京条约》。阿穆尔边区和乌苏里边区并入俄国。

第一章

I

英国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取得通商方面的优惠待遇,同时也为了普遍加强对东方的影响,打算于1856年冬至1857年,联合法国(英法联盟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有所减弱,此时也需要加强)向中国派遣一支庞大的远征军。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通过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普提雅廷伯爵获悉此事。他看出英国人的企图是觊觎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在他的坚持下,任命普提雅廷为公使和觐见中国皇帝的全权使臣,以便向清政府^①要求享有与其他列强将取得的同等权利和优惠待遇,同时了结在阿穆尔^②和吉尔吉斯草原的边界问题。

普提雅廷是从陆路去中国的。他顺利地抵达了恰克图,而从该地继续前进时,却出乎意料遭到办事大臣(中国东部的行政长官)的阻挠,后者在未获得最高当局的允准时,坚决拒绝放他进京。于是他向北京理藩院写了一份强有力的申诉,指控中国官员违反1728年^③《恰克图条约》(该约确认两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

① 根据俄国人的习惯,Маньчжурия一词使用范围很广,有时用作政府、皇朝一类的称号,有时用作地名(指今东北地方),有时指所属民族,此外尚有多种用法,本书按照现在通行的译法,凡属第一类者均称清政府、清廷、清帝……,属第二类者仍称满洲,属第三类者称满人、满族、满员、满臣……,其他则根据文义定译。——译者

② 即黑龙江。——译者

③ 按正式文献均称该约订于1727年。——译者

宣称，他对理藩院的批准只能等到5月15日，过此期限，在不论什么情况下，他将经由阿穆尔和满洲取最近的道路去北京。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为他提供过草原所需的交通工具，他将乘轮船，并至迟不超过7月1日抵达直隶湾。

普提雅廷没有等到回音，他确信已不能继续由陆路前进，于是改乘“亚美利加号”轮船，顺阿穆尔而下，在预定的日期内到达了直隶湾。

普提雅廷旋即试图和北京理藩院建立信函联系，但是毫无结果。普提雅廷发了一个声明，说他此行是为了弄清若干边界问题，同时要使清政府对遭受来自英国和法国方面威胁的危险，有所戒备。理藩院对此粗卤地答复说，它认为就边界问题和俄国公使进行任何谈判均属多余，而公使来京（这正是普提雅廷所力争的）是办不到的。中国人在复函中还指出，公文来往一律需经恰克图转送，以后，公使凡由直隶湾发出的一切函件，均不受理。

这样，清政府便在使1805年出使北京的戈洛夫金伯爵的使团*受挫以后，又以拒绝接待俄国公使而使俄国再度蒙受侮辱。普提雅廷企图和北京中央政权独立进行谈判，毫无结果，在虚掷了近一年的时光后，他终于参加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公使的行列，结伴来到天津。在这里，由于四大国代表的共同努力，清政府不再固执己见，中国遂与上述各国分别订立了条约。

俄国和美国的代表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时表现得最有分寸，这大大促进了对所提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由普提雅廷签署的《天津条约》，三日后就得到了清帝的批准。中国全权大臣秘密地将此事通知了公使，并且告知，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伯爵和黑龙江将军奕山已划定了以阿穆尔为界的新的俄中边界。按照《天津条

* 戈洛夫金使团之所以受挫，是因为特使抵达库伦后，怎样也未能使当地行政长官对他首先往访。

约》，俄国与其他列强在海路贸易、外交关系和传教活动方面同等地享有一切权利和优惠待遇。

虽然问题这样解决，似乎是公平合理的，但实际上，条约对别国人说来，远比对我们有利益。俄国既然没有商船，当然不能从条约赋予的权利中得到实惠，而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却能竭力利用这种权利。西伯利亚人公然抱怨说，我们的全权代表在签订条约时过分注意欧洲利益的一致性，却完全忽视了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漫长的陆上疆界，他有责任提出另外一些特殊的要求。

穆拉维约夫伯爵，尤其是恰克图行政长官是《天津条约》中被忽略的俄国陆上利益的主要捍卫者。他仔细分析了1858年8月送给他们的条约抄件，认定必须在条约批准之前增加几项补充条款，以巩固俄国从过去签订的条约中已取得的陆路通商权利，而《天津条约》对此却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对西伯利亚竟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许多人已开始议论必需将俄国军队开往蒙古和满洲，以使用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与此同时，对天津谈判的结果深感满意的普提雅廷，却拟订了一项进一步的行动纲领。他醉心于在北京确立俄国的影响，决定用俄国武器来支持中国，以对付英国和法国，从而实现这一目标。他并不满足于口头提议的效劳，还书面通知中国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说，奉俄皇之命，为训练中国军队于明年将提供足够数量的军事教官，同时，还要将最新式的大炮五十门，最新式有来复线的枪枝一万支运抵白河口，供中国政府使用。

与此同时，他还告知，俄国政府拟于1859年2月批准刚由他——普提雅廷签订的条约，届时将为此而任命一名新的俄国公使前来。普提雅廷劝告中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新任公使经由蒙古和满洲尽速到达，并担保说，如果俄国公使先于别国代表到达北京，他会授以机宜，不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将来提出苛求。

普提雅廷的友好建议远未受到预期的赞许。中国官员在异常迅速的答复中赞赏公使关于运送武器和派遣教官的美意，并表示全都欣然接受。至于公使来京问题，他们非但不答应帮助他加速行程，反而希望公使于一年以后来京，绝勿赶在别国使节前头，这些使节专爱因袭恶例，也正想从速来京。

尽管这种回答粗卤无礼，普提雅廷并未放弃他的初衷。还在他回俄国的途中，就从巴黎写信给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说明必须消除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东方事务中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理应属于俄国，并且将向中国提供俄国武器，作为实现这一目的最合理的手段之一。回到彼得堡后，他向外交部递交了一份述职书，发挥了他关于未来俄中关系的设想。普提雅廷认为，有外国代表在场，我国公使要在北京获得某种实质性的成果，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坚持公使要尽快去中国，以求在外国人到达前办毕条约的批准事宜，并了结对俄国最为重要的边界问题。他列举了据他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并据理说，必须：1. 为清政府购买它所承购的武器；2. 派遣五名军事教官去中国，帮助训练中国军队；3. 向太平洋派出一些吃水量不大的舰艇，以便在中国内河活动。普提雅廷建议在军事教官中选派一人，授以特命全权，使他能作为俄、中两国政府间的中间人，与各部大臣和军机处直接交涉。

所有这些建议在俄皇陛下召集的御前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并受到嘉许。

II

为了争取时间，决定不再从彼得堡派遣新的公使，而将在北京的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他曾参与穆拉维约夫在阿穆尔的谈判）改为公使衔，委派他办理《天津条约》的批准事宜。根据普提雅廷

的坚决主张和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的推荐，任命了上校侍从武官伊格那提耶夫担任选拔教官的工作。他于一年前作为一个特别军事考察团的团长被派赴布哈拉，不日即可来到。

伊格那提耶夫于1858年的圣诞节赶回彼得堡。在初次觐见俄皇时，陛下就提升他为御前侍从少将，并宣布任命他前往中国执行一项困难而又微妙的使命。

出使前所花的准备时间较之预计的为多。有鉴于负责组织中国全部军队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决定派遣各兵种的军事教官随同伊格那提耶夫前往。委派谢苗诺夫团上尉泽伊费尔特负责训练中国步兵，近卫军工兵营中尉泽伊姆负责建立工兵部队，近卫军骑炮兵上尉巴柳泽克负责建立炮兵部队，利申中尉负责组织猎兵部队，地形测绘师什姆科维奇负责绘制地形图。

出使必须急速进行，因为在所面临的道路泥泞的季节里，在西伯利亚地区通行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还因为伊格那提耶夫将军亟需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见面，而后者早在冬季即已声称，至迟到4月份他就要离开伊尔库次克。

3月6日，伊格那提耶夫从彼得堡出发，途经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彼尔姆、科雷万，尽管道路糟糕透顶，仍然于4月4日前赶到了伊尔库次克，因此还赶上穆拉维约夫尚未离开他的府邸。

伊格那提耶夫充分利用了在伊尔库次克逗留的七天，以便尽可能地了解和熟悉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局势。然后，他同总督来到恰克图，不料在此碰到了普提雅廷在两年前遇到过的同样的阻碍。

总督派往库伦的界务官^①卡尔波夫回来时带回消息说，蒙古的办事大臣不让俄国公使进京，因此只能在恰克图等待北京政府批准他们继续前行的通知。4月30日，期待已久的彼罗夫斯基的使者——总督的侍从武官希特罗沃终于来到了，他带来了《天津条

^① 旧译作“廓米萨尔”或“喀密萨尔”。——译者

约》的批准书，还要将它送往彼得堡。原来，彼罗夫斯基经过持续几个月的谈判，好不容易才使条约获得批准，而他所完成的使命也只限于此。中国人不仅不同意批准《璦琿条约》和签订彼罗夫斯基所提出的补充条约，而且竟无礼到凡与《天津条约》无关的谈判，一概予以拒绝。当他们看出，俄国全权代表的要求是由于提供俄制军械和派遣军事教官而提出时，就正式将两者均予以拒绝，并对一位新任俄国公使的来到（照他们看来，这件事既突如其来，而又毫无可取），表示诧异。

这些情况对于伊格那提耶夫的出使关系重大。由于事态出现了这一转折，作为此次出使的主要目标，即帮助中国办理军事这项任务便不复存在了。当中国的大臣们对彼罗夫斯基作了上述声明后，若再派遣俄国军事教官和运送军械，便属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了。于是伊格那提耶夫擅自改变了授予他的指令。由三百八十辆载有各种枪炮（伊热夫斯克城工厂制）的大车组成的运输队到达上乌丁斯克后就不再前进了。从彼得堡来的军官们（除巴柳泽克留在伊格那提耶夫身边外），均听凭总督安排。原拟用来装备大沽炮台的大炮运往诺夫戈罗德港，嗣后又运往尼古拉耶夫斯克^①，而轻武器则转交给了西伯利亚部队。这支部队在此以前仅有一些枪膛已经扩大的滑膛枪，其中多半还是燧石枪。拨给伊格那提耶夫用以建设中国武装部队的五十万卢布，则交由伊尔库次克金库保存。

所有这些处置，事后完全得到了俄皇的赞许和肯定。

III

中国人突然拒绝接受军械一事，完全改变了外交部预定的任务。以组织军事教练事务为主要目标的具有外交性质的一次出

^① 即庙街。——译者

使,此时则变为纯粹是为了完成一项外交使命了;没有取得任何外交职衔的伊格那提耶夫的地位也变得极其暧昧。为了摆脱这种处境,他立即请示外交部,目前他以使用何种正式官衔为宜。

这种待命状态结束得比预想的为快。5月15日,库伦行政长官派驿使携信驰报恰克图行政长官,声称,中国皇帝已同意让俄国公使进京。这种匆忙决定的原因,稍后才弄清楚。秉性顽固的中国人由于因循保守,不理解也不愿意承认,将彼罗夫斯基由一个教会的普通负责人(柳比莫夫、科瓦列夫斯基等人都曾任此职)改称为公使的高级职衔是合法的,因此,当皇帝得知真正的公使已抵恰克图时,立即下令准许他进京。

离开恰克图的行期定于5月24日。除了由伊格那提耶夫任命为侍从武官的巴柳泽克外,随行的有书记官、七等文官沃利夫,汉语译员、五等文官塔塔里诺夫和蒙语译员、少尉瓦姆布耶夫,还有由五名哥萨克人组成的护送队。

他们懂得,显赫的声势在东方民族的心目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因此竭尽全力,以最隆重的方式为出行者举行欢送仪式。在大教堂作完送行祈祷以后,全权代表在人潮簇拥下进入广场,署理总督职务的科尔萨科夫将军陪同他对广场上列队欢送他的地方军队进行检阅。伊格那提耶夫向部队致答礼后,就任他们朝着通往边界的道路开去,而他自己则在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和恰克图的地方长官、商界人士、女宾和几乎全体居民的陪同下,徒步前往边境。在恰克图和买卖城的中间地带,牧师们举行了简短的祈祷式,然后,伊格那提耶夫向全体送行者作了最后的告别,向部队道了谢,和市行政长官一起坐上马车,在三百名哥萨克人护送下,向蒙古境内的第一个驿站驶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做给当时在恰克图和买卖城的蒙古人和中国人看的。根据这些目击者的传述,住在北京的人们当然会认识到

俄国代表的力量、权势和地位。

IV

路途是漫长而艰难的。首先是通往北京的交通方式问题。在此以前，旅行者经常是以商队的方式行进的。而这次前往的使团觉得这样过于缓慢，决定试用中国的两轮马车。这一办法是成功的，坐两轮马车不仅舒适，更重要的是比较迅速。男女驭手们将马套上车轭，便头也不回地一往直前，而且多半是疾驰而去。

这样，伊格那提耶夫一行于5月27日到达库伦。他们在此逗留了两天，以便等候落在后面的人，同时，一般说来，也是进行一次行军间的休整。通过蒙古和戈壁草原的其它地方，用了十一天时间，其中在张家口又逗留了两天。

从蒙古一进入中国本土，地方当局和官员对俄国使团的态度便急速改变了。没有一处举行过正式的欢迎仪式，中国政府的全部关注仅限于派遣两名官员伴送该行人员到北京，而按照惯例，不仅对新到任的教会监护官，即使对于普通的信使，都得如此办理。

中国当局对使团的这种态度使全权代表耽心，从张家口到北京，而主要是进入京城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

6月15日，星期一，使团来到了北京城外的俄国公墓。除彼罗夫斯基和固礼神甫外，教会的全体教士和世俗人员都前往欢迎。在进城和去南馆的途中，伊格那提耶夫坐着彼罗夫斯基头天发去的一顶绿呢官轿，由骑马的随员和护送的哥萨克人簇拥而行。中国官员曾劝阻说，京城的百姓从未见过外国人坐这种官轿，俄国公使此行会在城门口引起骚动。使团对此当然置之不理；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使团在百姓十分安宁而又惊讶的状况下，隆重而顺利地穿越了全城。